

萤火·青春

本报记者黄臻、刘金海、李博

南京闹市区，一座古朴的宅院。朱漆大门隔绝了尘世的喧嚣，青砖黛瓦透露出历史的味道。初春探入门缝，微风轻拂树梢。院落西南角的一间斗室，窗外鸟鸣盈耳，屋内静谧无言，只听木屑从木板上掉落的沙沙声。

老旧的办公桌上，形状各异的刻刀摆放其间。案台边的铁皮小台灯，散发着莹白色光芒。王康蜷身伏案，右手紧握拳刀，左手顶住刀背，刻刀划过木板，隽秀的汉字慢慢成型。

任墙外车水马龙，眼前这一块棠梨木板，就是王康的整个世界。

一颗种子

身为金陵刻经印刷技艺第八代传承人，王康喜欢用“缘分”来形容他与这门古老技艺的关系。

2010年，还在南京市莫愁中等职业学校（现为南京非遗学院）就读古籍鉴定与修复专业的王康，在参观江苏省古籍修复成果展时，结识了金陵刻经处的两位传承人马荫青和邓清之。一份机缘，两位老师当场表示，如果感兴趣，可以到金陵刻经处系统地学习雕版印刷技艺。

这次偶然的相识，在从小就喜欢“倒腾木刻”的王康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不久后，每日乘车上学的王康意外地发现，公交线路因改道正好在金陵刻经处门前经过，刚刚种下的种子迅速发芽。

2011年，学校组织实习，王康找到了金陵刻经处。从拜师学艺到毕业工作，在他看来，“一切感觉都是安排好的”。

“一颗种子种下去，它在冥冥之中发芽生长。”王康说，“这条路是顺着走下来的，浑然天成的。”

位于南京市淮海路35号的金陵刻经处，1866年由晚清著名学者杨仁山创立，融古代经书、经版收藏、经书雕刻、印刷及流通于一体，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

时至今日，金陵刻经处仍然保持着以“雕版、刷印、装帧”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传统。在刻版时，底样选用老宋字，上样涂油后进行刊刻。在刷印时，先以帚子将水墨涂刷在经版上，再将宣纸覆上，用擦子压擦，然后揭下印好的书页。在装帧时，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齐栏、串纸捻、切书、打眼、贴封面、包角、装订、贴签条、装函套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

对于自己接触的的第一个想学雕版印刷的“90后”，金陵刻经印刷技艺第七代传承人邓清之，曾怀疑王康能不能“吃下这个苦”。

“刻字要收掉花哨的心，然后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做，从早晨坐到晚上。”邓清之说，“很多年轻人吃不下这个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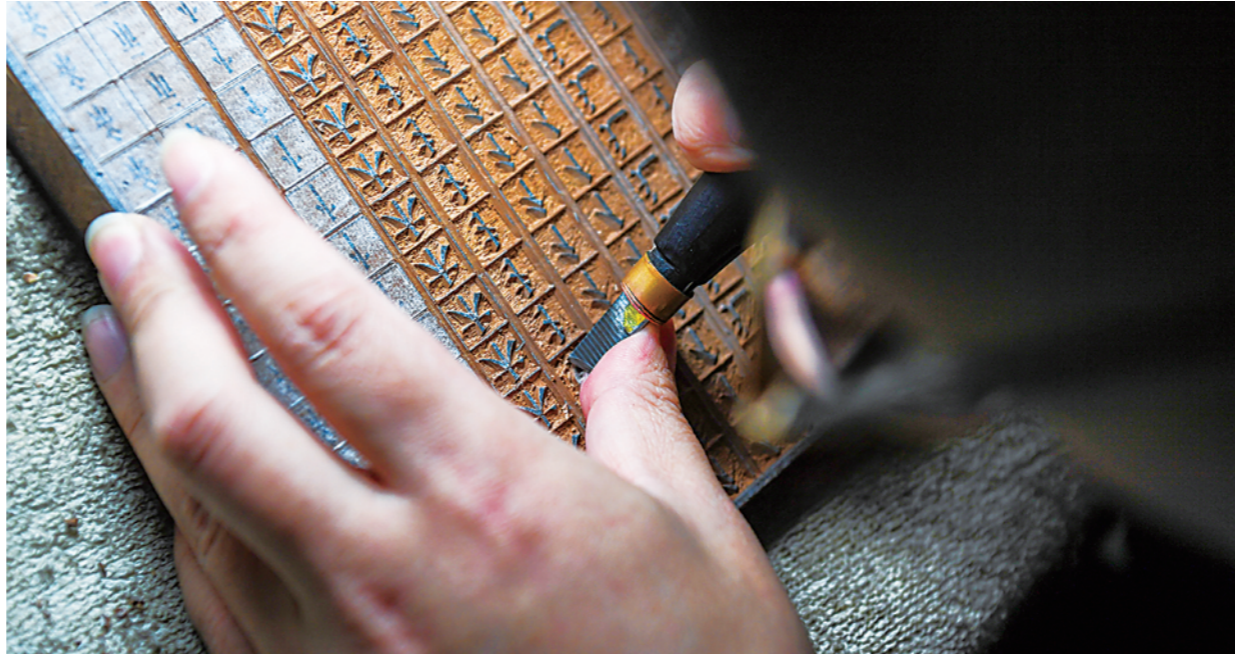
工作不仅辛苦，而且收入不高，面对世俗的考量，王康承认自己也想过放弃，但是心底里的热爱让他坚持了下来。

“从刻第一块雕版开始，我就喜欢上这种木屑从版片上面弹落的样子。”王康感慨道，“像一片片花瓣，被自己抛洒出去。”

“镇处之宝”

金陵刻经处后庭，有一座素雅的二层小楼，正门两侧“流通功德藏，接续人天师”的描金对

「九〇后」非遗传承人 刀与木之间，雕刻青春



▲王康在工作台前进行雕版木板篆刻练习。本组照片：本报记者李博



▲王康在工作台前进行雕版木板篆刻。

▲王康在金陵刻经处经版楼内整理经版。



联让人肃然起敬。这座“经版楼”，乃金陵刻经处的圣地所在，内藏经版12.5万片，汇集着一代代匠人的心血。

初来刻经处，王康正好赶上经版楼“手术”。为保内藏国宝于万全，金陵刻经处对经版楼进行改建加固，升级成可以满足条件的文物库房。

那时，王康与同事们一道，把库房中的版片搬运出来，逐片清理、整理归集，重新放回“升级”后的经版楼。正因如此，他说自己几乎与每片经版“结缘”，其中就包括“镇处之宝”——18块大型佛像版。

这18块大型佛像版大多刊刻于清光绪年间，不论从工艺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来说，都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

“第一次看见这18块版的时候，我就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王康的音调略微有些提升。

“刊刻出可以与之齐肩的作品，是我的人生梦想，即使这个梦想有些遥远。”

人只有在见识过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后，才会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镇处之宝”的亲密接触，让王康大为震撼，受此感召，开始潜心学艺。

“一般做学徒都是从观察开始。每天跟在师父后面，认真观察，不着急动手，看自己能从观察中看明白什么门道。”

王康口中的师父，名叫马荫青。他少年时因药物作用导致听觉受损，却是个“有心”的人。耳朵听不清就用眼睛。学艺时，马荫青一刻不停地观察师父们的手，反而学得比其他人还快，成为金陵刻经印刷技艺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动手刻字，需要一颗平静的心。按照王康的说法，内心浮躁的人，刻出来的东西是有“火气”的。

“比如说，你刚刚挤完早高峰过来，心还没

有平静下来就开始刻了，那你刻出来的东西，就夹杂着急躁的‘火气’在其中的。人没缓和下，不那么从容。你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是对自己手艺的不尊重。”

俯首、屏气、凝神，刻刀游走在木板之上，思绪沉浸在方寸之间。师父告诉王康，刻的过程，也是炼的过程。锤炼的不仅仅是手上的功夫，还有人的心智。

“自己要达到什么样，怎么样去达到，别人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王康说，“在炼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高度，到没有办法精进的时候，就再来一遍，这种由熟返生的过程，很关键。”

斗转星移，瞬息十年，王康参与了20多部古籍、近10万字的雕刻。他说，每当倾心雕刻的版片新鲜出炉，那种喜悦感，就如同“亲眼见证婴儿的诞生”。

慧灯不熄

师父师父，如师如父。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是在世界印刷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遗存，历来为师徒世代口传身授。

“学习雕版有这样一个过程：先进门的时候就是制作工具，一般这个工具是师傅先带你制作一套，然后你要学会琢磨，学会自己使用它，之后接受雕版的训练，包括选材、上样，然后雕版，最后进行整理这一系列的过程，也是师徒之间感情的建立。”

多年的教诲，身与艺的传承，王康将之视为一个疼惜自己天分的过程。

“这么些年，我和师父的交流完全不需要语言，基本上一个眼神就能互相明白。就像盐野米松在《留住手艺》里写的那样，学活计的过程就是怀着颗诚实的心去理解对方的过

程。同吃一锅饭，同干一个活，自然而然，师徒的关系就形成了。”每一天，王康跟着师父静静地坐在白墙黑瓦的老房子里开始并结束一天的工作。

从清同治五年（1866年）金陵刻经处创立至今，这里的雕版印刷技艺已传八代，其中第四代传承人因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暂复兴，人数达到19人之多，而后人数骤减，到了王康这一代，迎来了转机。

2009年，“金陵刻经印刷技艺”代表“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方方面面的关注骤然增多。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传统文化复兴，很多高校开设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和相关专业。在邓清之眼中，王康他们这批“90后”跟她入行的起点不一样，“他们学的这个专业，是带着基础来的。”王康从大专二年级左右开始接触这项技艺，先从素描再到绘画，再到工笔，之后到装帧和装裱，最后进入到雕版印刷。

邓清之认为，师父带徒弟本身是在互相提高，对于她和马荫青这样传统的手工艺者来说，急需新鲜血液的到来，为刻经处增添几朝香火。

王康刻字的时候喜欢听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一边听，一边去做喜欢的事，仿佛感受到“宇宙的呼吸”。刻字是慢功夫，心到了，手才能到。师父们那个年代一天可以刻100个字。到了王康这一代，刻40个字需要一天，一面板子一般400个字，刻一块板子至少10天，非常磨炼心性。

闲暇时，王康喜欢国漫，也喜欢玩游戏。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刻经技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是古人的智慧，也吸纳了刻字人独有的气韵生动，在具备传统工艺文化美感与价值的同时，人的气息也在雕版作品上入木三

分。2020年，凭借精湛的技艺，王康被认定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印刷技艺”最年轻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觉得工匠精神倒不是说，你这个行业一定要做得如何如何好。像我们这种手工技艺，它必然是要被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所替代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手艺人这份坚守和执着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各行各业都是需要的。”邓清之说。

金陵刻经处如今藏有雕版12.5万块，精熟的雕版师屈指可数，备份所有雕版需要5000多年，严峻的现实迫使传承人必须找寻遗产保护的新路径。采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对其进行保护很有必要，利用现代数字化手段是对金陵刻经印刷技艺中传统雕版印刷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效补充。

“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需在涵养传统精髓的同时，进一步契合时代，有效利用现代传媒方式，进行广泛传播，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感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的独到内涵，体会只属于我们的‘文化’与‘远方’。”同为“90后”学徒的刘鼎一提出自己的见解。

择一事，事一生

听自然的话，是每个手艺人懂的道理。马荫青要求徒弟们要了解适合用来雕刻的木材，不是选最好的，是最合适的。金陵版的刻板一直使用的是棠梨木，软硬适中，价格也不贵。找到上好的棠梨木，在写样工序之前，需把板子用沸水煮熟后再阴干，一般在冬天刚刚过去的时候进行，然后把它们拿出来阴干，哪怕板子长毛，也只能阴干，入秋之后，再开始刨光。

据王康介绍，一块刚雕好的书版拿去印刷，印出的线条笔画突出，棱角分明，却不是最好看的。只有印到成百上千次后，墨汁吃透了木板，经过帚子不断打磨，笔画变得圆润起来，印出的作品才是最美的，这是木板褪去了“火气”的结果。每张纸和每张纸之间也有区别，取决于温度，可能多加了一点点墨，颜色会深一点，少加一点墨，可能会枯一点。仿似一个火种，会燎原。

“手工艺这件事，不光工序之间的顺序不能变，前人告诉你的节气也不能变，说是冬天做的事，错过了，你就只能等明年冬天来，比如你若非要在夏天泡板子，最后板子会大部分开裂，最后影响刻工的雕刻，也不可能留有传下来的好雕版，一意孤行地‘提前安排’，反倒浪费了一年的时间。”王康介绍说，为了保护珍贵的木刻经版与古籍，经版楼上百年不用烟火，光源就是天上的日光与月光，真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院子里面有那么多花，那么多草，每块雕版，就像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所开的花，它有它独特的一个香味。”

刻印考究，字大醒目，纸墨精良的“金陵版”雕刻工艺历经百年不衰，融入的是传承人的“匠心”。每一个齐整的汉字都带有刻经人指尖的余温。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在金陵刻经处薪火相传。一代代刻经人，始终愿意为这门手艺，磨出陪伴一生的老茧。

这无法复制的绝世雕刻技艺，在他们的指尖绽放了百年芳华。

如今，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王康也开始带自己的徒弟。

王康疑惑：“怎么教？”
师父答曰：“以前怎么学，现在就怎么教。” 本期主持：黄臻

“北漂”30年的泰籍“外教奶奶”

本报记者陈倩慈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常常能见到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她满头银发，慈眉善目，总是笑眯眯的。今年77岁的葛潘·纳卜芭看起来与寻常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有人上前搭话时，她才会微笑着用略显生涩的中文说：“我听不懂，我是泰国人。”

葛潘是泰国清迈皇家大学派至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泰语系的泰籍专家，她自1992年起便多次来到中国执教，2005年退休之后更是扎根中国，至今坚守教学岗位，被学生们誉为中国泰语教育界的“常青树”。

葛潘不懂中文，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上课时一支粉笔、一手板书便足矣，日常沟通则只靠面对面交流和一部座机电话。正是这样一位低调、简居、随和、执着的老人，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活跃在外交、新闻、教育、经贸等各个领域的泰语人才，为中泰两国的友好交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龄北漂”不懂中文

2022年是葛潘与中国结缘的第30个年头。“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把这里当作个人教学生涯的终点站。”葛潘说。

“3月1号到北京来！”这是葛潘至今仍脱口而出的一句中文。从清迈到北京，接近3000公里，这对当时已经47岁的葛潘来说是个莫大的挑战。“怕也是怕的，因为除了旅游之外从没想过要出国。”

担忧和忐忑没有阻挡葛潘来华的脚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的责任感，总是调侃自己为“低科技”老教师的葛潘，想尽一切



▲葛潘在北外课堂上讲课。受访者供图

办法也要让自己的课堂走上正轨：来不及学中文就把拼音学好；跟新生语言不通就用英语、用动作、用表情……

葛潘说，刚到北京时，生活难免遇到一些难题，包括语言上的障碍。但身边总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我能在北京待这么多年，多亏了有那么多热心帮助我的老师和学生。”

“外教奶奶”退而不休

2005年，在葛潘即将退休之际，清迈皇家大学有意请她继续留华执教，她欣然同意，却未曾想在学期中途得知双亲相继不幸离世的消息。当时学生还没考完试，尽管承受着巨大的悲痛，葛潘仍在完成手头工作之后才匆忙回国处理后事。

“我曾向父母许诺，退休之后便去跟他们住，现在双亲都不在了，我已无归处，不如离开伤心之地，继续来中国教书。”时隔多年，葛潘再提及此事已是云淡风轻。

在泰语系学生眼里，葛潘就像一台“永动机”，她上课总是提前到教室，比很多学生

都要早，一堂课两个小时，她能从头到尾不休息，还意犹未尽。为了让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泰语，她总不吝于拿出课外时间来辅导学生。

有学生曾经打趣称，“泰语专业的教室有两间，一间在教学楼，一间在专家楼。”后者指的正是葛潘在北外西院专家楼的住处。从大一开始，葛潘就会让学生分组轮流去她家“上课”——大一教发音、组词，大二教造句、对话，大三教演讲、作文，大四辅导论文……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工作日抑或周末，只要有时间，葛潘随时欢迎学生上门。不知从哪一届学生开始，他们更喜欢亲切地称呼葛潘为“奶奶”，而这位热爱教学工作的老外教也颇为欢喜，“我教过的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

“因为有学生在”

葛潘不仅是学生们眼中“可敬可爱的奶奶”，还是北外泰语系的老师们最信赖的泰国专家，更是在中泰文化交流合作中当仁不让的国际友人。她一直尽己所能，帮助中泰两国人民加深彼此了解。授课之余，葛潘还参与文学教材、词典的编写工作。每当北外师生遇到任何与泰语、泰国有关的问题，学识渊博的她总是耐心讲解。

葛潘住处的那一部座机电话常年像她一样忙碌，铃声一响，电话那头连着的可能是四散在天南海北的学生。日常为已经毕业的学生答疑解惑，葛潘戏称这是她的“售后服务”。

葛潘常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在中国待这么久？”
她的回答总是“因为有学生在”。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郭刚、张文静、王紫轩）阳春三月，午后暖阳斑驳而入，整个教室顿时温馨而明亮起来。精神矍铄的乌力老师正用“老外”的视角和学生探讨中国哲学，现场气氛热烈。

今年64岁的乌力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平日里，他不仅承担着繁忙的语言教学工作，还主动带领学生在中德文化的“对话”中感悟人生。多年的努力使他成为师生眼中最热情的文化使者。

架起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源于乌力早在40多年前就已萌芽的“中国梦”。

旅行家马可·波罗著作里的中国见闻，激发了乌力对东方的向往之情。上大学时，乌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他的专业，希望通过语言学习来认识了解中国。

乌力念念不忘的“中国梦”终于在2013年得以实现。他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在黄河之滨的省会兰州开启逐梦之旅。

课堂上，乌力是集博学、风趣、亲和力于一身的魅力“老头”。他常常设计一些有趣好玩的教学活动，比如通过分组辩论练习口语、以角色扮演了解欧洲文化等。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拉近了中国学生和德语、和欧洲文化的距离。

“乌力老师教会我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重要的是打开了我主动学习异国文化的那一扇窗。他还精通中文、法文、俄文。从他身上，

兰州大学，有位恶补文言文的德籍外教

我也看到了终身学习的乐趣。”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2018级学生许建豪说。

生活中，乌力是个学无止境的“年轻人”。来中国的9年时间里，他自创了看童书练声调、唠嗑中练反应的方法，普通话水平突飞猛进。当然，一切努力都绕不开乌力的梦想：“传播文化、沟通世界”。

热爱哲学的他希望将中国哲学准确、详细地介绍给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乌力花了近20年时间将一本介绍中国思想史的法语书籍翻译为德语。下个月，这本600多页的书籍即将出版。

为厘清书中有关中国哲学的专业词汇，乌力找到文学院学生“恶补”中国古代书面用语——文言文。在他看来，啃下这块硬骨头，就能打开中德更久远，也更深层次文化的“交流之门”。

乌力说：“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但德国了解中国哲学的人并不多。我希望能够成为沟通两国文化的‘桥梁’，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把更多精彩而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介绍给欧洲。”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林丽娜表示，乌力不仅是一位恪尽职守的教师，还是一位拥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文化研究者，乌力影响了她心中关于“外语教师”的定义。

春风起舞，万物生长。当下，乌力正享受着在中国的教学生活之乐、生活之趣及译者之欣慰。他计划翻译更多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人知道的不只是大熊猫、太极拳，还有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